

# 《抵达之谜》的女性人物对世界和平的启示

赵祥凤

(牡丹江师范学院 英语教育系,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小说《抵达之谜》是一部女性主题的小说。小说表现了女性(尤其第三世界女性)在无声中生存、在求生中丧生、在有声中挣扎的三种生存状态。女性要走出这三种悲惨境地,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自身的问题、与异性的关系问题、与同性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女性无声中生存、在求生中丧生、在有声中挣扎的生存状况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奈保尔对当今社会的建议。

[关键词]奈保尔;《抵达之谜》;女性她者

[中图分类号]I561.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9)07-0189-03

移民作家 V. S 奈保尔的小说《抵达之谜》发表于 1987年,他于 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小说被认为是后殖民小说的代表。自 1987年发表以来,对其评论主要集中在奈保尔的世界观和文化观、身份认证、边缘感等主题。作为一名著名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在其后殖民小说中多次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孤独、流放、模仿、身份认证、杂糅等主题。《抵达之谜》作为一部半自传体、后殖民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女性主题的小说。笔者认为《抵达之谜》这部小说具有女性主题,并体现了女性艰难的生存境地:在无声中生存,为了发出声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保存有声的境地要在你死我活中挣扎。以此唤起人们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同情,并为女性的有声提出建议。

—

“在夫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在主体的建构与客体的形成之间,女人的身影消失了,不是进入太古虚无,而是陷进一种第三世界妇女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激烈穿梭的置换性构建中。”<sup>[1]</sup>女人在夫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遏制下,从未拥有主体地位,她们是丈夫的客体。由于主体地位的丧失,女性往往是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话语加以利用的工具。斯皮瓦克由此断言,“性别上的从属阶级(贱民)无处发言。”<sup>[1]</sup>发言是指一种发言人与听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发言者可以说话,而且所说的话要被听得见,只有当说和听都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语言行为才得以真正完成。否则,即使女性她者是在发言,她的发言也是无意义。《抵达之谜》中有几位这样无声的女性。首先,她们没有自己的姓名,只能够被称为“杰克的妻子”、“皮顿的妻子”、等,直到小说的结尾,读者也没有发现这些女性的姓名。姓名是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标志。在小说中,杰克和皮顿是外来者,他们在庄园里处于从属地位,而他们的妻子则处于从属中的从属地位,成为他者中的她者。斯皮瓦克指出,第三世界的妇女无疑是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他者中的她者,“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sup>[2]</sup>第二,她们经济上不独立,没有工作,只是随从丈夫来到庄园里。在经济上,她们处于边缘地位,她们的命运由男性控制。丈夫的升迁是女人一辈子的希望,是她们过上好日子的唯

[收稿日期]2009-04-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诺贝尔奖小说《抵达之谜》的主题对当今社会的意义”(1152214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赵祥凤(1971-),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副教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一途径。女人的幸福建立在男人身上，“她的生活模式，她的丈夫取代了她的父亲，她的儿子又取代了她的丈夫。她的生活周而复始，她过着同样的生活或者同样生活的不同版本。”<sup>[3]</sup>第三，她们没有自我意识，处于从属地位的她们已经习惯了边缘的生活方式，她们不是情感的中心，婚姻也不是以情感为中心，而是以生存为中心。对于女性来说，丈夫意味着衣食住行，是物质，而不是精神。视生存为第一需求的女性要委身于男人，情感需要往往很匮乏，因此当伴侣死去，对方并不伤心，为了生存，马上改嫁成为她们最好的选择。当杰克死去，他的妻子从居住的小屋搬出时，“对杰克的妻子来说，是一件好事。”<sup>[3]</sup>当杰克死去，杰克的妻子离开了庄园搬进了城里，改嫁后外表穿着全变了。对她来说，换一个丈夫就是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 二

布伦达与其他女性一样，布伦达也是随从她的丈夫来到庄园里。她的丈夫莱斯是一位临时工，在庄园里修剪果树。布伦达是《抵达之谜》中唯一有名字的女性，她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甘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她知道自己处于婚姻的主体地位，婚姻对布伦达来说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衣食住行，她渴望被爱、被异性欣赏。布伦达的美丽与性感是她丈夫的骄傲但也是痛苦所在，布伦达不甘愿无声无息地在庄园里生存，因此她用别具一格的服饰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她不同于庄园里的其他女性，她对自己的丈夫有精神需求，她渴望被爱，渴望对丈夫的精神占有。因此，她对于她的丈夫来说是不安全的。她认为她的价值体现在自己吸引男人的魅力，“她深刻地懂得这一点”。但是，可悲的是，她的丈夫没有认识到妻子作为女性的需求。布伦达想引起丈夫的注意，与意大利人私奔，最后被人抛弃，又回到了莱斯身边。莱斯“谋杀”了她，因为她“嘲弄”了他，男性以非常严肃的方式处理了她的随意。男人为女性提供了生存保障，就要求女性完全服从，并对其拥有生杀大权。“现实是男人世界，她很难进入现实世界，女人与现实世界的唯一通道是她的丈夫，而把她弃置与冷冰冰的孤独寂寞之中的正是她的丈夫。”<sup>[4]</sup>当布伦达被杀害以后，意大利人继续着大量中央加热的买卖。“莱斯正在他的红色小汽车里四处奔忙寻找一份新的工作。”<sup>[3]</sup>“所有人都同情那个活着的人，那个幸存者，那个男人。”<sup>[3]</sup>男人以自己的权威让“嘲弄”他们的女性永远消失，他们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没有舆论的谴责，甚至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可怜的布伦达为了引起丈夫的注意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个牺牲又是如此毫无价值，她的死竟然是这样无声无息。

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能、欲望和社会环境是产生悲剧命运的原因。生存、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对于贫困的女人来说，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以付出一切为代价获取世俗的幸福，要么甘于现状贫苦而死”。当布伦达对生存的现状不满足，要寻找幸福时，被尘世社会所吞噬。她认识不到悲剧的原因，当她把自己的命运由一个男人转向另一个男人时，走向了毁灭。

第三世界女性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在男权社会里，决定了女性永远生活在男人的控制之下，女性要甘愿受丈夫的统治，“他者中的她者”比西方国家的女性更是多了一层压力。美国作家莫里森在作品里尤其关注黑人女性，她认为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的社会地位更低，黑人男性把在白人世界受到的压力全部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因此黑人女性受到双重的压力。第三世界以及被殖民地的女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作为“他者”的男性，把身处边缘的痛苦、与主流文化的分离、宗主国的压迫都转嫁到女人身上，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同时，因为他们落后、愚昧，加重了女性作为替罪羊的灾难。第三世界的女性寻求幸福的道路更加崎岖、绝望。由于地位卑微，她们没有社会身份，成为没有话语权的群体。她们不仅在社会中以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无法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还要受到同属一个阶层的男性他者的侵害，这些原本与女性她者属于同一个阶层的男性却以暴力，用强权、压迫、宰制和欺骗来侮辱比他们更弱小、缺少自卫能力、没有言语权的女性她者，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的行为使女性她者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成为哑言群体。

## 三

孙妮认为《抵达之谜》是奈保尔以艾略特的方式所描写的现代荒原：人人“身体无能”，精神荒芜，世

界没有生命力,一片废墟。人们的颓废状态来源于对颓废社会的失望,他们看不到社会前进的动力,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因此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欧洲社会人信仰的缺失在这小小的庄园里得到体现。体现了奈保尔对英国等宗主国文明的失望。《抵达之谜》的女人们没有孩子,没有对未来的希望。奈保尔用许多词语来刻画庄园的衰败,“死气沉沉”、“破败”、“死的东西的颜色,枯死的草,死的植物,泥土,沙子,一个死亡的世界——几乎根本没有颜色。”<sup>[3]</sup>

菲利普斯太太是庄园里唯一一位具有经济收入的女性,她对没有自我意识的杰克的妻子和皮顿的妻子充满了蔑视,对具有自我意识的布伦达充满敌意,她是庄园的管家,是庄园里真正的统治者,是庄园主的精神支柱。因此,她拥有一切特权。但是,被雇佣者的身份是她无法摆脱的事实。因此,菲利普斯太太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威,可谓是用尽心良苦,尽量使用标准的语言、用优雅的举止换得别人的尊敬。为了保住自己在庄园里的地位,菲利普斯太太也是作品中的荒原人物之一,没有后代,从来不为明天打算,从来不计划未来,没有存款,没有住房,每周末到市区放纵自己,然后又回到庄园里来得过且过。菲利普斯太太怕比她优秀的人在庄园里留下来,她对比自己优秀女性的拒绝来源于对女性的嫉妒,她的自我优越感是同女性相比而获得,因此她认为对自己优越地位的威胁也是来自于女性,她认为她的目前处境只会受到同性的威胁,并没有认识到女性的悲剧真正来自哪里。她对自我意识较强的布伦达充满了敌意,当菲利普斯太太故意没有把布伦达向莱斯求救的电话转达,导致布伦达误解了莱斯,一气之下与意大利人私奔,走向了杀身之祸。她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布伦达的悲剧。她对同性的伤害使女性更加可悲。

作为西方女性代表的菲利普斯太太对第三世界的女性属下充满敌视和鄙视,是对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姐妹情谊”一种最大讽刺。无论是菲利普斯太太还是布伦达事实上都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同属低下阶层,两人之间应有所谓的“姐妹情谊”。只不过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是残酷的现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奈保尔的《抵达之谜》同时向读者展示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性的关系问题。斯皮瓦克认为,由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与当地的父权制勾结起来,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妇女的待遇每况愈下,日渐贫困,尽管西方世界的女性也是父权制的牺牲品,但是西方妇女属于获利的西方社会,享受着来自第三世界的财富和资源,不可能与第三世界妇女同属一个层次。

第三世界女性是“游离于男性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女性。她们的生活愿望总是受到来自社会、宗教和传统习俗的种种限制。”<sup>[4]</sup>“妇女要走出悲剧命运,首先就应该走上渐有声音的道路,让蜗居在私人空间里不被人注意,不被人聆听的女性属下有表现自己、为自己言说的机会”。<sup>[5]</sup>女性的解放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女性自身的问题、女性与男性的问题,女性与女性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在女性她者的身上更为明显。此外,正如斯皮瓦克所建议:第一世界的女性应和女性她者对话,相互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女权主义之间的多元共处。她主张主流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女权主义、世界中心和世界边缘的女权主义,欧美与第三世界地区的女权主义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协商对话,而不必总是处在相互对立的状态。正确处理女性问题,尤其第三世界女性问题,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斯皮瓦克. 属下能说话吗? [M]. 罗钢, 刘象愚主编. 后殖民文化理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44.
- [2] 佳·查·斯皮瓦克. 底层人能说话吗? [M]. 斯皮瓦克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7.
- [3] 奈保尔. 抵达之谜 [M]. 邹海伦, 蔡曙光,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 [4] 任一鸣. 后殖民文学“静默”主题的女性视角——三位女性后殖民作家及其作品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2 (1): 125.
- [5] 舒笑梅. 让属下妇女言说分治历史——《分裂印度》中的两个象征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 (1): 134.

[责任编辑: 曹金钟]